

漳州文史資料

(初稿)

目 录

- | | |
|-------------------------------|-----|
| 1. 一个老红军的回忆录
——1932年4月间的片断 | 吴行敏 |
| 2. 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校沿革(1902—1949) | 施仁熙 |
| 3. 漳州丹霞半月楼 | 谢家群 |
| 4. 台湾教会与厦门教区的关系(1859—1945) | 黄子玉 |
| 5. 弘一法师在闽南 | 熊寒江 |
| 6. 内、交警六队的产生与消灭(1946—1949) | 祁维光 |
| 7. 编后 | |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

政协漳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漳州市

一个红军战士的回忆录

——1932年4月片断

吴行敏

一九三二年春天，闽南大地一片红，天空格外明朗。阳光雨露滋润万物生长，共产党、毛主席给人民带来了光明与幸福。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象找到了亲爹娘，投身红军，编在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十五军四十三师，当时我才十五岁，为了解放全人类和解放自己，踏上了战斗的征程。因为我会讲普通话，四十三师政治部就由我在师部工作。我的具体任务是给曾学楷师长、高自立政委作本地话的翻译，白天黑夜和师首长们的警卫员一起学习和工作。师首长象自己的父亲，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和安全。当时，师部情报机关得悉：龙山土匪头吴利运阴谋派人给我打黑枪，准备给我收拾掉，以减少对这些土匪恶霸的威胁。师首长指示，不准我个人出门。那时我刚入革命队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都未认识到，懂得不很多，但只有一条清楚，坚决服从、积极为革命工作。我在师首长身边，日夜审查核对各连队报告上来的社会调查材料；商讨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成立新兵连，吸收新战士等工作。通过宣传发动，广大贫下中农对党、对红军政策逐步加深了解。怀疑打消了，对党的政策积极支持和拥护。在龙山这个二万多人口的集镇，当师部在桥头挂起“自愿参加红军报名处”的大红布条后，不几天，报名的青年就有百多名，招收八十多名。新兵连很快就满员了，编制很快建立起来。师首长为加强新兵连的政治思想工作，班长、连长、指导员都配备了，我也去充任娃娃的班长。每天生活可紧张啦！伙食、装备都很好，打土豪分得来的鸡鸭鱼肉吃不完。每人发发的单衣二套，棉衣二双，步枪每人一支。我们班娃娃多，全是短马枪。上午由政治

指导员上政治课，内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红军的任务、党的政策等。下午由连长上军事课，从队形变化到瞄准射击等，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唱革命歌曲，生活过得紧张有意思。

我在师部工作这段时间，常常干到通宵达旦。有一次，师部得悉永丰乡土匪头子陈国璋，阴谋拌入红军内应进行捣乱，计划率二百余个土匪，假投降参加红军。条件是他的部属保留完整建制，由他指挥。狡猾奸诈施展的这条计策早已为师首长所识破。师长将计就计，满口答应，召开军民联欢会，当场把土匪包围缴械，根除土匪头子陈国璋。这次军事计划事先我是不知道，思想上也无准备。当时，我们队伍开到永丰乡祠堂里，联欢会就开始了。主席台上放了一张桌子，三把长条凳子，桌子上摆一把水壶，一个茶杯。主席台前放了许多长条凳子，土匪却坐在长凳子上。男男女女、老的少的老百姓，都围在会场外面看热闹。师特务连战士在乡村内外到处设防锁住，师首长和我在主席台上，警卫排手捧卜壳枪散坐在听众之中。大会先由师长讲话，我当翻译，师长话讲完了，大会休息片刻。接着，由高自立政委讲话，当政委讲话将要结束时，我只看政委把烟头往地下一摔，警卫排战士即举枪在土匪背后，大喊：“举手缴枪”迅速将土匪头子捆绑起来。当时会场骚动，乱作一团，土匪是全付武装参加会议的，有的拔出卜壳枪乱放一阵，惊动了坊外妇女小孩，啼哭乱叫。我和师首长从主席台的小门转移到屋外，不久，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当天下午即获胜回龙山。根除了陈国璋，为龙山永丰乡广大穷人除一大害。这对我们英勇善战的工农红军是微不足道的小战斗，但对于我这初入队伍的红小鬼来说，却是极生动的一次政治课。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九日，红军主力打到天空，消灭赣匪的主力，解放了漳州。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率领和指挥的。

红军入漳的任务：第一，是要调动广东军阀来闽西，半途截击，减少北路来的威胁；第二，是解决经济给养。这次红军入漳后，共筹集了百万现款，解决了布匹、鞋子、药品等重要物资。

红军入漳后，在小山城等处分了田，建立闽南人民革命委员会，王占春同志任主席。同时扩大了武装力量，把原来游击队和新扩大的队伍，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冯异飞同志为团长，王占春同志兼政委，蔡协民同志代表省委指导他们的斗争。

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校沿革

施仁滨

漳州第一中学的前身，是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校。从清末的漳州府中学堂称起，到现在已有七十多年。由于历次学制改革，校名更易及人事变动，情况不断变化。我在这个学校连续服务四十多年，谨以亲身经历及师友记忆，并采访有关史料写成此文，略述其沿革，以供参考。

福建省立龙溪中学校，由福建省龙溪初级中学校与福建省立龙溪高级中学校两校合并而成。初中于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当时科举尚未废除，学校名为“漳州府中学堂”，校址在城北紫芝山的芝山书院与开元寺相毗邻。创办人是漳州知府傅袁，以吴一鹤为监督，开办两班：予科一班修业年限一年，正科一班修业年限三年，学生计二百余人。高中于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当时科举已废学校方兴，校名为“汀漳龙师范传习所”，校址在城南威镇阁（即八卦楼）边的丹霞书院。创办人是汀漳龙边尹李仲平，以吴朝珪为监督，来往南洋向华侨募捐二十余万元为经费，学生三百余人。

一九〇七年春（光绪三十三年），汀漳龙师范传习所改名为“汀漳龙师范简易科”，增办附属小学堂，设在丹霞塘畔奎文阁。

一九一二年（清宣统三年），学部通令各省废止师范简易科，遂改为“汀漳龙初级师范学堂”因吴朝珪卒，再委陈之磷为监督，仅办本科三班。

一九一三年，漳州府中学堂与汀漳龙初级师范学堂合并改称为“漳州师中学堂”，校址在丹霞书院。由教育会公推侯炳煌为校长，由陈林崧代理。同年夏，陈林崧出任漳浦县长，省教育司委吴春元接任，再分别改称为汀漳龙师范学校（五年制）两班，与漳州府中学校（四年制）四班，学生人数大大发足，办理较为完善。一九一五年秋，吴春元去职，由王廷瓚接任。

一九一六年秋，师、中两校都归省办，汀漳龙师范学校改称为“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五年制），省派黄恩培为校长。分为预科与本科，预科修业年限为一年，学生毕业后经甄别试验及格，得升入本科。本科修业年限四年，学生有享受公家供膳待遇，并在寒暑假发给制服各一套。到毕业时可前往江浙两省参观教育，旅费由学生原属县政府发给。

一九一八年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割据漳州统治之后，有不少进步人士来漳进行新文化活动，当时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在课程上也学习社会主义学科，接受进步思想，组织学生自治会，进行革命活动，出版《二师周刊》组织“二师书报服务团”，介绍省内外新书及闽星报社书刊。组织“工学会”在课外时间阅读书报，以及制作教学文具物品，设印刷厂印刷试卷、信封、信笺供应学生应用。还时常演出革命话剧，如苏联剧本《夜未央》……等。

一九二〇年附设“龙溪县单级教员养成所”一班，一年后结束，一九二一年再办“龙溪县理教专修科”（一年制）一班，两校经费均由龙溪政府负担每月四十元。教学由“二师”教师兼任。

每月各津贴十元。同年理数专修科并入龙溪县立高初级中学，学校简称“五校”。由龙溪县立师范甲种工业、甲种农业、甲种商业及理数专修科等校合併。

漳州府中学校改称为福建省立第八中学（四年制），省方委任傅君基为校长，校址在丹霞书院，学生数骤然增加。

一九二〇年，师范、八中两校再分开。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初中部），迁移芝山东麓原净众院旧址。至一九二二年添建校舍一座。楼上教师宿舍，楼下各门办公室，并修葺原万寿宫旧址为膳厅。一九二三年，除办四年制以外，还增办三三制班级，复建学生宿舍一座。

一九二五年校长傅君基离职，先后继任者有施翔棠与林有壬。在原有一九二六年初三三制之外，增办高中二年级一班，以后併入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校。次年，当第一次大革命北伐军奠定福州之后，成立福建省政务委员会。在教育事业方面建立福建省教育改造委员会，通令全省各私立学校暂时行办，奉福建省教育改造委员会通令：“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改名为福建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校。”不久又增办初中两班，学校行政改为委员制，原师中两校校长同时去职。第三高中由陈开泰为校务委员会主席委员，陈张煌教务主任郑祥鸾任学监，吴春元任庶务主任，郑璣等为委员。福建省立第八中学校改名为福建省立第八初级中学校，委任吴玉德为校务执行委员会主席委员，黄宗璠、郑江涛、李永绥、林有壬等为委员。后李永绥、林有壬相继离职，以陈学朱、关师光补充。

一九二八年二月恢复校长制，福建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校，省仍委陈开泰继任校长。后因办理不善去职。

一九二九年福建省立第三高级中学校改名为福建省立龙溪高级中学校，委任陈良戡为校长。当时的班级数是九班，学生一百

七十五人，教職員工三十人。福建省立第八初級中學校，改名為福建省立龍溪初級中學校，校長吳玉德，班級六班，學生二百一十五人，教職員工二十二名。

一九三〇年福建省立龍溪高級中學校校長陳良璣離職，省委派沈裕康接任。令高初兩校合併，在接收初中時學生群起反對，滿城遍貼打倒沈裕康標語，教廳乃派許訓毅為初中主任，延至是年十月間才合併，校名改稱為福建省立龍溪中學校。為了办学方便，高級中學乃遷移芝山初中校舍由龍溪縣政府主辦，將高中全中校舍出讓給地方紳商，開設霞美飯店旅社及娛樂場所，所得款項四萬六千元，新建校舍三座，即現漳州第一中學的新華樓、五愛樓、生物室旧址。

一九三一年沈裕康病故，由庄觀瀾繼任校長。班級有九班，學生一百六十人，教職員工三十人。

一九三四年八月教育廳新辦一所福建省立龍溪師範學校。當時因校舍尚未建築，為節約經費開支乃與龍溪中學校合併。時班級計十五班，學生三百六十六人，教職員工五十一人。一九三五年八月兩校分開，省廳另派尹日新為省立龍溪師範學校校長。是年省立龍溪中學校校長庄觀瀾病重，校務由教務主任徐文彬代理。

一九三六年八月省派王秀南任省立龍溪中學校校長，當時班級數十四班，學生數三百九十人，教職員工四十三人。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開始，學校奉令內遷到長泰縣岩溪圩，附屬小學至此停辦，時班級十三班，學生五百零三人，教職員工三十二人。

一九三八年王秀南調任福州師範學校，校長由蘇克惠繼任。時班級十三班，學生五百八十人，教職員工三十三人。

一九三九年蘇克惠調任福建省立南靖師範學校，校長由鄭璣繼任。時班級十二班，學生五百六十二人，教職員工三十人。一九四〇年春，厦門失陷。省令再內遷漳平縣永福圩。時班級計十三

班，学生六百五十六人，教職員三十二人。

一九四一年形势好转，学校迁回南靖县水潮乡。这时班级计十三班，学生七百九十五人，教職員三十七人。

一九四二年八月，郑徽调任福建省立南靖师范学校，由谢新周接任校长，这时班级数十五班，学生数八百八十一人，教職員四十五人。一九四三年班级数增至十六班，学生数一千零三十一人，教職員五十人。这年二月间迁回南靖县靖城镇，并在华安县仙都乡设立分校。这时班级数计十七班，学生一千零三人，教職員五十四人。

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本市。因在抗战期中校舍遭受敌机炸毁，只剩一座五爱楼。还有一座较完整校舍，竟被国民党驻军全行拆卸，将材料移去建筑南坑营，这种军队保家卫国不足，蚕食殃民有余。又因学校用具往返迁移搬运中损失很多，一时未能尽复旧观，高中行暂借在南山寺上课；初中行校舍借用前福建省立龙溪职业学校旧址。（现漳州第二中学）。班级有十七班，学生一千零五十一人，教職員四十九人。到一九四六年校舍修建完成，才迁入现在校址。这时班级十七班，学生九百五十一人，教職員五十二人。一九四七年班级十八班，学生八百四十人，教職員五十一人。一九四八年班级十九班，学生九百七十三人，教職員 $\times\times$ 人。一九四九年班级十九班，学生一千一百二十九人，教職員 $\times\times$ 人。是年九月十九日漳州年放，军统特务分子谢新周在年放二个月前托病赴厦就医逃亡台湾。其职务由教务主任杨振藩代理到一九五〇年二月，奉龙溪专员公署委任为校长，李传业为付校长。这时班级十七班，学生八百六十二人，教職員 $\times\times$ 人。一九五二年七月杨振藩离职，以后改名为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

漳州“丹霞半月楼”

漳州东南面的霞麓里，原有一座丹霞书院（现漳州五中附近），据说是纪念宋朝理学家朱熹在漳州讲学创设的，初建在清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以后经过两次扩建讲堂、书舍，拓宽庭宇、清浚池塘，造桥跨岸名为“卧波”，滨堤筑石，遍植丛竹杨柳。池北有一个半月楼，题额写着“近水先得”，取“月之恒亦渐进而明”的寓意。这个普通的小楼房，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国民党闽南特委在漳州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

一九二二年辛亥革命以后，丹霞书院从清末的“漳州府中学堂”改为福建省立第八中学，与“省立二师”合并，设在丹霞书院的旧址。到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中共闽南特委、厦门“工运”领袖罗扬才同志到漳州来。在一个初夏的夜晚，他来到丹霞书院池北的半月楼中，和“省二师”的教师季康会面。听了这位教师会发动组织学生进行宣传的情况，还讨论了今后的宣传工作意见，谈话直到深夜才分手告别。

当时，罗扬才同志住在下营“广义棧”（现北京路“龙师”教工宿舍）。他经常到振成巷十七号台籍青年李山火家中，会见翁振华（台籍）和他爱人谢志坚（化名叶影），让他们与漳州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丹霞半月楼”建立起漳州第一个党组织的活动点。从半月楼走向丹霞西侧，有个“省二师”附属印刷厂，工人许士祯同志是闽南党组织的主要骨干，曾是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当时，出版的《二师校刊》发表过不少进步文章，指出青年学生应该参加革命运动，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正确方向。

一九二六年四月，翁振华同志任漳州党组书记。十一月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进驻漳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漳州小组曾印发《为欢迎北伐告漳州父老书》。不久，“省二师”与“省八中”停

办。十二月在漳州成立中共闽南特委，罗明同志任书记。为巩固革命阵地，开展群众运动，先后改组各个协会。由翁振华、李联星、季永绥、谢志坚分别主持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工作。一时革命浪潮滚滚，纷纷成立工会、农会、学联、妇联、商民协会及教育、印刷、邮电、民船等工会。龙溪、漳浦等县农民协会，雨后春笋蓬勃发见。如王占春同志在南乡领导的农民运动，驱逐霸踞在龙溪县农会的余高坚；打倒石码镇商会长王皇帝，逮捕“太子篮步青”押到漳州中山公园审判。工人们还清算王为黄斗星霸占龙溪县总工会。还有当时创办的《漳州民报》、《民声周刊》扩大了党的宣传阵地，得到印刷工人的大力支持。在党的领导下，以印刷工人许士森同志为代表，向资方提出改善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要求，进行多次斗争后获得完满胜利。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在中共闽南特委领导下，在丹霞书院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设“漳州工农运动讲习班”，由陈景从兼主任，请翁振华、李联星、季永绥、谢志坚等担任讲师。学员六十多人，其中团员占一半；大多数是来自漳属各县的青年干部和男女学生。党的优秀儿女聚会在“丹霞半月楼”的周围，以后成为闽南革命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里也受到漳州驻军的摧残，“工农运动讲习班”也被迫解散。

一九三〇年以后的“丹霞书院”被反动军阀以五万块银元的代价，卖给私商经营“霞里乐园”，开设饭店、妓院、赌场、烟馆。把一片风景秀丽的“漳州第二公园”，变成充满乌烟瘴气的官绅子弟“销金窟”。直到解放后才恢复重建为龙溪师范附属小学，现改为漳州五中以及“漳州工人温泉疗养院”的一部分，至今，还保留着“半月楼”，这座为漳州人民所景仰的革命历史遗址。

台湾教会与厦门教区的关系

黄子玉

一八五九年以前，台湾还没有教友，一八五九年以后（清咸丰九年）厦门神父开始到台湾传教。到一八八三年（清同治七年）福建分为两个教区，即福州教区与厦门教区。这时台湾教务正式划入厦门教区领导，首任厦门教区主教是 *andreas chinchon* (杨)，经过四个主教：杨、冯、周、黎。自一九一五年起，台湾神父马守仁从台湾来厦门当主教时，台湾教务和厦门教区开始分家，另立监牧区。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外，在人事上是互相来往的。如黎明辉、马守仁、林茂材是从台湾调到厦门，江谦修女等是从厦门调到那里传教的；而且厦门教区修院还为台湾培养台湾神父，如涂明正等。不分彼此，仍然一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决定在它本土以及它的殖民地，所有上层神职人员，如主教、本堂、院长等要职应由日籍神父充任。因此，在台湾的西班牙监牧被免职，另派日籍人员替代。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台湾领土归还我国。日籍代监牧临走时，西班牙“多明我会”要他移交教权，日籍代监牧不允而反驳说：“我们日本是向中国政府投降而不是向西班牙政府投降，教权应移交与台籍神父涂明正不能移交给你们。”台湾神长以及教友欢呼祖国胜利强盛，教会也抬了头，但是西班牙“多明我会”死不甘心，千方百计压迫涂代监牧让位。涂代监牧受到种种压力和威胁，曾向罗马教廷驻华代表蔡宁申诉，并请求于斌协助支援。可是申诉、请求不但得不到支持，而且在他们恣愿下被迫让位，徒嘆奈何！

一九三六年第×届国际圣体大会在岷里拉举行，厦门台湾等地教友由厦乘船出发，在船上因厦门和台湾的教友语言和风俗习

慣相同，显得特别亲热，好比骨肉兄弟。每天早上同在一起望弥撒领圣体，晚上同在一块念经。抵达岷里拉时，受津泉旅菲同乡会热烈招待；圣体大会开幕时整队进行，台湾的教友与我们同队，同样在中国国旗的引导下前进。第三天，日本代表队来到，台湾教友被迫到他们的行列中。在向我们告别时，含淚痛骂李鸿章出卖祖国领土台湾，签订台胞的卖身书，长叹何时何日才得归回祖国的怀抱里？！总之，在帝国主义教会势力范围内，在罗马教廷控制下，中国教会要独立自主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一九四六年所谓“圣统制”公布后，也不过是一种旨在缓和与中国教友的反帝斗争情绪，装门面骗局而已。

从历史来看，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宗教史实来看，台湾教会自古就是厦门教区的一部分。

弘一法师在闽南

熊寒江

弘一法师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知名人士，一九二八年来福建，先后住在厦门南普陀寺、泉州开元寺和漳州南山寺等佛教寺院驻锡讲律。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在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享年六十二岁。他在福建十四年，无论佛门或社会上，都留下他的威名，闽南一带人们，对法师尤其熟稔。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法名演音，号弘一。原籍浙江平湖，出生于天津市，父亲经营外贸，家庭巨富，本是个翩翩佳公子。早年在上海读书，秉性聪颖，才华过人。后来留学日本，毕业於东京上野艺专。他富有创新精神，擅长绘画、音乐、书法、金石，

也喜於写诗著文。他抱负不凡，富有爱国热忱，是革命文艺团体“南社”的成员。在日本，他曾与欧阳予倩等创办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剧社”，上流小仲马的名剧《茶花女》，亲自登台扮演剧中女主角，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弘一法师回国后，先在上海做报社编辑，后来到杭州、南京两地任教，讲授艺术。无论在工作成就与学术造诣上，都很出色。可是这位才华很高的艺术大师，却于一九一八年秋，年仅三十九岁时，趁学校师生放假回家去后，在杭州虎跑寺出了家，闭门谢客，虽妻子来寺，也拒不相见。他从此当了二十四年和尚，直至圆寂。从弘一法师的人生历程，可以看出旧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曲折和复杂。

厦门数浪吟

弘一法师来闽南后，曾在厦门各地居住，当从永春再转到时，曾主持讲解过《心经》。有一天，他走在路上，看见一只彩蝶被风吹打，颤抖挣扎在地，不忍这一小小生灵丧生便急忙救起，待眼看这只蝴蝶飞进附近花园中去之后，才肯离去。当厦门沦陷前四天（三八年五月八日）漳州南山寺僧众延请法师来漳，住在寺中石佛殿边屋。抗日战争期间，敌机经常来漳骚扰轰炸，寺内僧徒曾劝法师躲避，法师笑答：“僧人未能为国抗戈禦敌，有何贪生怕死。”始终坚持留在寺中，没有出走。

接着，漳东“尊元楼”唸经佛会请弘一法师至祈保亭驻锡。法师住在后楼上，并取其谐音，改祈保亭为“七宝寺”，还亲笔书写一块横匾挂在寺前。弘一法师生活十分俭朴，随身行李极为简单，仅有一领单薄浅青色棉衫，一床用纸粘补破处的旧蚊帐，一支破布伞，和几本经书，余无其他什物。他严守佛门律宗，忍饥耐寒，夏天身上穿一短灰布衣，外套一件深灰色夏布长海青；冬天严寒时，仅加穿一件短深灰衣而已。食不过午，每天早晨四时和午前十时，各吃豆饭二小碗，终日不吃其他东西。当各男人士

备送素菜来寺时，他也只尝几口即起席告罄。凡国内各地汇给他
的钱款，除留少许作伙食费外，均囑泉州跟来的僧徒性常分送
给各寺院；至於送来的笔墨笺纸等，除必需外，亦一概谢绝。各
方寄来的信件，他还将原信封、信笺在剪裁、翻刻后加予利用。

弘一法师在浙江第一师范执教时，因被甄道等书刊受感，曾
于一九一六冬到大慈山断食学道。后在马一浮先生影响下，转而
学佛。出家那一年九月，在西湖灵隐寺受戒，发心修习戒律严格的
律宗，被佛门中称之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每天
早起，都在楼上漫步打圈，默念佛经，口不出声，不打木鱼，不
敲钟磬。在他住锡七宝寺期间，曾讲经二次：第一次在“尊元楼”
讲《弥陀经》；第二次在山顶巷“太阳公庙”（后改“三晃寺”）讲
《普门品》。法师宣讲经书，句解分明，一时佛教界和地方人士闻风
踵至听讲。

弘一法师在漳州时，四方闻名前来拜访的甚众，他真诚接待，
交谈经史典故和闽南地方志事。法师正坐如磐，两眼凝视，不作
左右顾盼，显得十分端庄肃穆。法师自出家后，放弃艺事，不再
多撰诗词歌赋，唯有各界人士前来向他取书法的，则不分身份老
少，都爽然答应。他站着一边磨墨一边念经，写多少，磨多少，
不肯浪费点滴墨汁。书写多是对联，都从《华严经》中集句书成，
（他曾编《华严经集联三百》一书）。法师在漳州书写的字对，大
小约在千对以上，可说是他生前写得最多的地方。他在未出家之前
篆隸行楷，各体均有，但是在出家后，书法苍古脱俗，富有骨力，
独成一家。他精通金石，素擅篆刻，在他皈依佛门之前，曾将所
有印章数百枚，积贮杭州西冷印社壁中，外镌“印芷”两字。漳
州尹某曾把法师过去刊载在杂志刊物上的书画歌词和著作，以及
扮演茶花女的剧照，收集整理，精订成册，书名《弘一法师前尘
捕（同“剪”）集》，寄给法师，他看过之后，在书上题了“一切

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偈，仍予寄还。

当法师在七宝寺住五个月后，移居东乡石厝岩上的石室内，翌年二、三月间，因湿气生病，迁居南山寺。不到几天，由泉州僧众迎去静修，从此法师往来于闽南各地，直至1942年在泉州圆寂。

弘一法师与柳亚子先生以及学生丰子恺交往甚厚，相互间常有诗画往来。在闽南一带，留下的真迹颇多，被人们视为珍贵文物。泉州开元寺中，保存了法师的《春游》词曲手稿彩本和一九三五年十月在惠安净峰寺所作《将去净峰为题》五绝一首亲笔书写的条幅。当他住在厦门万石岩时，曾自题居所为“殉教堂”。漳州南一寺中，至今仍珍藏有法师的书法和丰子恺的画页，旅游观光者至此，均渴望一睹名家的真迹。

伪交警“第六总队”的产生与消灭

祁缉光

交警总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交通平交通警察总局交警第×总队”，前身是军统局头子戴笠在抗战末期串同美蒋成立“中美合作所”，先后开办了十几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制造出几万名“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的武装特务。日本投降后，收编了一个伪汪伪军，改编交通巡查总队，就用这些混血性特务中队，编成十八个“交通警察总队”，成为维护美蒋利益的工具。

我原是中美合作所华安班忠救军教导队营付营长，与梅县中美所十三班合并改编为交警第六总队时担任付大队长，到最后被消灭前夕任总队长。现将亲身见闻的历史事实回忆如下。

日本投降后，原中美合作所第六班（即华安班）和十三班，先后由华安县和梅县调到厦门集中整编。一九四六年一月，军统局派少将高参胡子萍，交井总局派上校黄天存到厦门点验，将两班的忠救军和别动军，合并改编为“交通平交通井察总局交井第六总队”。总队下设政工、督察、军需、军医副官等五个室；六个直属队：即特务队、通讯队、迫炮队、平炮队、运输队和卫生队。下辖三个大队，每大队三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中队均设团防连、排、班三、三制，每班十四人编组，全总队官兵约计二千八百多人。这些人百分之九十都是闽粤边境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被军统局指使两省边区各县的“三青团”及地头蛇，以“中美联盟抗日”号召，骗到华安班和梅训班训练。到抗战胜利，听说，要改编为交井，开到北方去打内战，多不愿离开家乡而移徙逃范。

当时交井总局长吉章简是广东人，即委其同乡，“梅训班”付主任汤毅生为交井第六总队长，总队下设各室、直属队和大队，多安排梅训班的广东老乡。原华安班有两个付主任，陈达元调去台湾，雷镇钟调苏北交井十五总队长，三个闽南营长汤涛、汤秉衡、连济民，及一些连排长均被剔除，只留下外营营长杨卓夫、付营长祁辉光，被改编为第一大队长和付大队长，华安班原有三千多官兵淘汰了一半多。于一九四六年秋天，勉强拖带到沪宁铁路上去护路，由于兵员不足，交井总局又将西南公路局护路大队调来补充。

这时交井副局长换了周伟龙，把汤毅生调到北平路内城前线任交井指挥官。军统局长毛人凤调他的浙江亲信周文新来接任第六总队长，官佐人事又开~~始~~调整，兵员继续逃亡，又到浙江军官区接收一部分新兵来补充，于是整个总队质量变了样。过去汤毅生以他的“梅训班”干部来控制总队各队，利用“华安班”的全

下武器和干部，来到训练装备原“梅训班”的徒手官兵，引起华安班官兵的鄙弃和不满。周文新接任总队后，转而休偕华安班的人员，提升他的浙江同乡杨卓夫去任文井营第四总队长，并祁揖光为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撤换了汤殿生的第二、三大队长，换上浙江人王治文为第二大队长，提升原华安班付大队长潘浩星为第三大队长。总队中人事也大变，调浙江人婁宗青来接替广东人翁汝琛的付总队长，新调来总队付王崇元，政工室主任汤兆鹄，督察室主任丁渭，付官室主任彭罗金，军需室主任薛嘉祥，军医室主任郑达。直属队除特务队和运输队是周的私人队长外，其余通讯队长江春晖，迫炮队长赵凌霄，平炮队长陈锡英，卫生队长郑达谦均系华安班成员。经过一年多的人事变迁以后，总队才称固定下来。

总队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初步合并编成，但由于广东派在人事装备各方面的控制，和“华安班”被迫传授操课技术，还受到严密的监督歧视，因此不满而逃跑。汤殿生为了保存反人民实力，对未逃者日夜加强控制，对已逃者则派人到闽南各县去抓捕。以为这样就可以制止井兵不再逃走，但是没有^{达到}主观愿望。直到井兵被押上美国运兵舰上，因颱风不能出海北开，停在厦门港内时，井兵聚屑纷纷乘小艇围绕运兵舰呼喚，有个井兵应声跳下海向他聚屑小艇游去，翁汝琛还命令哨兵开机枪将他射杀沉海。就这样将当年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保家乡的青年，强迫到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前线。

沪宁铁路在美蒋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后，被称为国际交通路线，是沟通帝国主义巢穴的上海与蒋邦统治中心南京的命脉，是当时南京政府军事人员物资支援华北、东北的主要交通线。原来是由第八、第十五及第十八等三个总队担任护路，第六总队到达后接替第八总队，由昆山到常州奔牛站沿线防务。另派一个大队，担